

诗意与哲思之间：朱右白的学问人生

◎ 叶树勋

朱右白（1896—1961），名广福，又名光溥，字右白，以字行。江苏泰兴人。自幼喜读古书，爱好诗文，先后就读于金陵一中、金陵大学、天津工专等学校。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先生，攻读儒家哲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南京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等处工作。1956年调往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从事水史研究。1960年因被错划为“右派”故遣返泰兴老家，翌年病逝。右白先生学问渊博，著述颇丰，在古代哲学研究、诗文理论和水史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并创作有大量诗歌，是一位颖慧而勤勉的学者和诗人。

一、家世与成长

1896年农历九月，朱右白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的一个耕读之家。其叔祖朱铭盘是晚清诗人和书法家，以诗文享誉公卿间。其父朱月清是私塾老师，兼从事中医。其母操作农事，耕种棉麻，织布谋生。当时朱家并不宽裕，家里人常将粮食、棉布拿到集市上卖，为朱右白挣取学费。他成年以后写有一诗回忆儿时的家境：

昔者念我姑，苦节常家居，爱我无不至，慰我能读书。……老父披衣起，流光未及曙。阿母事晨炊，青烟间晓雾。……是时幌帟间，微闻书声度。稚子寻呼鸡，红日满

窗西。^①

朱右白伯父家里的三个儿子皆子承父业当医生，父亲朱月清在做塾师之余也兼做医生。朱右白自小立志读书，诗里说“爱我无不至，慰我能读书”，指的就是其姑母因其读书之志而对他尤加珍爱。在“流光未及曙”的清晨里，母亲操弄晨炊，准备白天的农活，父亲则早早地披衣诵读，鸡啼声与读书声两相交织，这样的耕读环境对朱右白的成长影响颇深。

在家学的熏陶下，朱右白自幼喜好吟诵，犹喜《孟子》，为日后从事学问奠定了良好基础。其后来自述曰：“幼禀父教，嗜吟若其天成”，“右白以如是之文艺环境，而能不怠于学”^②；“幼时喜读《孟子》，惟多未能领悟。每诵至《告子》《尽心》两章，于所论心身性命之处，辄觉陈义太深，匪浅学所能解。然有僻性，每于义之愈不可解者，即愈思，有以求其解，设终不解，则终若芒刺之在背也”^③。家学环境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他产生了影响：一是在家庭的文艺氛围里幼而嗜吟，自小培养了一种“诗文情怀”；二是在塾师之父的教导下习读古书，此中尤喜《孟子》，心里潜蕴一股“孟子情结”。自幼养成的两种情志，对朱右白以后学问事业的方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1909年，朱右白年十四，入读县立高小，过了两年，升读中校。在校期间，主要学习新学科目，“于旧学不暇兼顾，惟求文字稍顺而已”^④。辛亥革命以后，县立中校停办，朱右白转学到金陵一中。第二年，因二次革命军起，朱右白离校回乡，居家一年。在这一年里，朱右白阅览古

① 朱右白：《村居忆往》，收入《朱右白诗》，上海：新文印书馆，1940年，第31页。

② 朱右白：《现代诗坛·作者自述》，收入《右白丛书》，南京：中文仿宋印书馆，1944年，第112页。

③ 朱广福（右白）：《自传》，载吴其昌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辑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④ 朱广福（右白）：《自传》，载吴其昌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辑三》。

书，其意甚得，“取旧时国学书籍读之，以为其深盎然有味也”^①。1914年，朱右白入读金陵大学高等科，兼修中西文学和自然科学。后因教会问题从金陵大学退学^②，转读天津工专，攻读应用化学。起初，朱右白不大喜欢这个专业，而后则渐感有趣，尤其喜爱其间的分析方法，“以其甚有系统，足为整理国学之助也”^③。由于时局动荡，朱右白少时辗转求学于多所学校，但一直念念不忘的是研习古书，深味国学，以至于大学期间攻读理工科时，乃因其方法有助于整理国学而渐感可亲。在朱先生后来的治学中，可以看到这一思维方法对他的学术工作确实有很大帮助。

朱右白在天津工专求学四年，1920年毕业后，返家乡泰兴工作，供职于县立乙工校，历任教员、校长。其间，朱右白与同县黄氏结婚，育有一子朱业恒。^④任教期间，他对学校的教育状况不满，尝试改革而未能如意，后来在1925年辞职入京。在京期间，他以中英文家教为业，闲暇之时则“浸沉国籍，兼取当代名辈著述读之”^⑤。北京的游学经历使朱右白能广涉当时学界的大家名著，这为他接下来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奠定了基础。

二、在清华的求学时光

1926年夏，朱右白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年入学的还有王力、姜

-
- ① 朱广福（右白）：《自传》，载吴其昌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辑三》。
- ② 此系根据朱右白《自传》所述。具体何因，朱先生没细说。当时的金陵大学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尤其是其中的“学点制”，更被人指责为钳制学生思想自由的工具。按这一制度，学生从周一到周六需参加朝会，周日需参加礼拜，否则将扣除其“学点”（参见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34页）。朱右白或是不满于这种宗教化教育而从该校退学。
- ③ 朱广福（右白）：《自传》，载吴其昌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辑三》。
- ④ 因材料所限，对黄女士的情况知之甚少。根据朱右白毕业返乡的时间和朱业恒出生的时间，我们推测朱右白与黄女士的结婚时间可能在1920年至1923年之间。据朱右白的女儿朱新兰教授口述，黄女士在朱业恒出生几年后病故。
- ⑤ 朱广福（右白）：《自传》，载吴其昌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辑三》。



亮夫、杨鸿烈、谢国桢、冯国瑞、戴家祥等人，共计新生 29 名。^①按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规定，新生入学后向导师陈述研究意向，在导师建议下选定研究专题。朱右白入学后，以梁启超先生为导师，选儒家哲学为主修科目，研究专题为“性之讨研”。^②朱右白后来写有一诗，记载了当时和同门一同拜谒梁任公的情景：

初谒师门时，乃在清秋节；玉露满清阶，月明疑照雪。

弟子十余人，坐分两行列，各陈研究题，指授听师说；各饱所需归，中情何愉悦！^③

朱右白入学清华的那一年，恰逢梁任公主讲儒家哲学^④，这与朱右白自幼潜藏的“孟子情结”相契合，他之所以选儒家哲学为主修科目，并非偶然。在他的《自传》里，朱右白曾解释了当年选题的原因：

兹所从事研讨者，仍即童年读《孟》时所未能解，而欲求解之性善恶问题是也。^⑤

梁任公先生讲论儒家哲学，颇重视其间的人性论，视之为儒家哲学的首要问题，对其有精卓之见。^⑥而朱右白幼年读《孟子》时，即对其间的论性之说最感深邃，长年积蕴于心，今番得遇明师，其欢愉之情可想而知，诗中说到“各饱所需归，中情何愉悦”，写的就是朱右白和各位同

① 1926 年 8 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共录取新生 24 名，备取 2 名。开学后实到 24 名，补录 4 名，另有上届考取因经济困难未入学的杨鸿烈，也于本届入学，本学年新生共计 29 名。参见孙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 1 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04 页。

② 《研究院纪事》，《国学论丛》1927 年第 1 卷第 1 号。

③ 朱右白：《梁门哀感录·记初谒》，《鲁阳集》，上海：女子书店，1933 年，第 31 页。

④ 《研究院纪事》，《国学论丛》1927 年第 1 卷第 1 号。

⑤ 朱广福（右白）：《自传》，载吴其昌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辑三》，2009 年。

⑥ 梁任公认为儒家哲学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性善恶的问题、天命的问题、心体的问题。参见梁启超：《儒家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70-72 页。

门向导师请示选题之后的欢快心情。

在国学院求学期间，朱右白在主修儒家哲学的同时，对国学院诸导师的课程亦深有修习。按当时国学院的教学制度，课程的开设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类，普通演讲类是学生的必修课，由教授择定题目，每周开讲一次或两次；专题研究类则根据各人的研究课题进行选修。^①在1926—1927学年里，各位导师的普通演讲课程有：梁任公先生开设“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王国维先生主讲“仪礼”和“说文练习”，赵元任先生、陈寅恪先生分别开设“音韵练习”和“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李济先生则主讲“普通人类学”和“人体测验”。^②这些课程广泛包括国学研究的多个领域，且涉及国外汉学。朱右白在当时的环境里，不仅能进一步夯实国学的功底，且在学术视野上也得到很大的拓展，可学习到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接触到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

朱先生的专题论文《性之讨研》大约在1927年5月撰成。导师梁任公阅后予以很高评价，认为此文“叙述诸家学说简要以提挈”，“皆见匠心”^③，并“嘱即付梓”^④。后因故出版事搁置，直至1941年始刊行于世，并更名为《诸家人性论评述》。先生重新修整，“取师所认为琐碎挂漏之点，一一裁补润饰之，而益以新说，俾与世相见”^⑤。

在20世纪20年代，学界对古代人性论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诸家人性论评述》一书是该领域研究史上比较早的一部专著。当前学界在研究古代人性论时，一般比较关注从阮元《性命古训》、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到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的学术脉络，右白先生此著当引起重视。他将古代人性论史划分为创始时期、继承时期、脱分时期、实际人生论时期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各为一篇，第五篇则进行总结评价。书中广征

① 参见孙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第307-308页。

② 《研究院纪事》，《国学论丛》1927年第1卷第1号。

③ 梁启超：《新会梁先生任公原评》，见朱右白：《诸家人性论评述》，南京：中日文化协会，1941年。

④ 朱右白：《诸家人性论评述·后序》。

⑤ 朱右白：《诸家人性论评述·后序》。



博引，条分缕析，考辨诸家要义，提出许多精辟之见。如论孟、荀之异：“孟子道性善，系从源头上说；荀子言性恶，系从流弊上说。”^①朱右白以“源”“流”定位孟、荀，在其看来，孟、荀论人性，非就同一事而主相反之论。又如以大程、阳明为一派，视小程、朱子为一系，将大程从传统所说的“程朱”系统中区分出来。现代以来，陆续有学者注重二程学说之分异，朱先生以人性论为视角区别二程，在学术史上是比较早的论断。^②

1927年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随后在工字厅开师生叙别午宴。四位导师各领一席，师生畅谈甚欢。将散之际，梁任公起立致辞，历述学生之成绩，并期以“国学重镇”之厚望。席散，朱右白与姚名达^③、冯国瑞同游朗润园，归途中，朱右白提议到王国维先生府上拜别。行至王先生寓所，适逢王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家里谈话。王先生接到家人电话后，即从陈先生家里返回，与朱右白等三人畅谈甚久，“恳恳切切，博问而精答，相语竟一小时。晚餐已列，起身告辞，先生亦送至庭中，亦向例也”^④。

殊不知，此番拜见王先生竟是永别！^⑤王先生投湖前几无预兆，事发后全院师生均感意外，大师顿然仙去，哀恸之情何以堪。朱右白曾作挽

① 朱右白：《诸家人性论评述》，第11页。

② 如钱穆、冯友兰等人，即深究二程学说之异，且明言陆王心学源于大程之思想（参见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23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3页）。钱先生《国学概论》写成于1926年，冯先生《中国哲学史》写成于1930年，时间上来看，钱先生持论更早。右白先生《诸家人性论评述》原稿（《性之讨研》）始作于1926年，写成于1927年，与钱先生立论时间相差无几。二者之间有无影响，尚待考证。关于二程学说，虽二者确有区别，但是否可分别视作心学与理学的源头，还有待商榷。这方面可参见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0页）的讨论。

③ 姚名达系1925年入学，1927年毕业。参见孙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第322页。

④ 姚名达：《哀余断忆》，《姚名达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148页。

⑤ 王国维先生于6月2日上午在颐和园投湖自沉。参见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2页。

诗悼念王国维先生，言道：“东原去后观堂出，再起斯文二百年。收拾残经传绝绪，钩沉古史得新篇。工字厅前逢雅集，风诗说剑兴偏长。不知此老怀孤愤，径欲向人诉九章。”^①朱右白以戴震之后续来评价王先生的学问，用屈原的事迹来类比王先生的情况，对先师的敬仰和哀恸之情溢于言表。

是年6月底，梁任公偕研究院学生同游北海，发表谈话一篇，归结为“做人”“做学问”两大要义。^②梁任公在谈话中说到了自己对弟子之道德和知识的期望，复针砭时弊，鼓励学生们共谋改造之。朱右白与导师及同窗并游北海，恭聆师教之后，甚为感触，曾作一诗记述当时情景：

夫子行尤健，独严义利辨。春风快雪堂，一再相勸勉：
教起由自身，于以及同门；同门想感应，渐以化同群。所至
唯心主，自无欲作盂。远之天下安，近为一身补。此言良足
珍，再拜书诸绅。^③

朱右白以“再拜书诸绅”来表达自己对梁任公北海训教的珍惜之意。^④梁任公对他的影响颇深，不仅在学术研究上，也包括做人方面。毕业以后，朱右白作了不少诗歌缅怀先师，追忆师门往事，感念所受教诲。梁任公去世后，朱右白曾作挽诗悼念：“四海沉沦公砥柱，天留木铎警群邪。存心只欲争人兽，不为一身不为家。满地疮痍劫未休，频挥老泪向清秋。”^⑤朱右白在此诗里以“天留木铎警群邪”喻示梁先生的道德志业^⑥，又以“满

① 朱右白：《挽海宁王师静庵》，《鲁阳集》，第27-28页。

② 梁启超：《北海谈话记》，《梁启超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0-697页。

③ 朱右白：《梁门哀感录·记北海训话》，《鲁阳集》，第34页。

④ 《论语·卫灵公》有载，子张曾向孔子请教德行，孔子答以“言忠信，行笃敬”，子张随后“书诸绅”。朱右白以此类比，足见其对梁任公先生的敬爱之情。

⑤ 朱右白：《挽梁师任公》，《鲁阳集》，第28-29页。

⑥ 《论语·八佾》有载，仪封人请见孔子，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朱右白在诗里以“木铎”比拟梁任公，可见其对先师的崇敬之意。



地疮痍劫未休，频挥老泪向清秋”感慨先师的壮志未酬。在此后的岁月里，朱右白常以“吾师所期于我者”自勉^①，以此作为自己做人、做学问的精神向导。

朱右白在清华求学期间和同窗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他后来所作的诗歌里，回忆同窗者多达数十首。如《秋日忆秋华同学五首》回忆在国学院期间与冯国瑞、姚名达、侯堦、颜虚心、吴其昌等人的交往情景；而《梁门哀感录》的诸篇诗作，慨叹“燕逐东西飞，车分南北辙”^②的现况，回味当年齐聚一堂的欢愉情境，其间一首《记天桥买葛》记述了当年和冯国瑞等人一同买葛，归途中即兴赋诗的趣景。毕业以后，朱右白和姚名达、侯堦、冯国瑞等人来往密切。姚名达毕业后曾和朱右白一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数年，其间经朱右白玉成，姚名达与巴怡南结为夫妇。^③侯堦在毕业以后也和朱右白交往较多，朱右白的第一部诗集《鲁阳集》，也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请侯堦作的序。冯国瑞毕业后回乡任教，供职于兰州大学，与朱右白书信往来频繁，在书信中朱右白常作诗词遥寄思念之情。

三、动荡时局中的学术事业

从清华毕业以后，朱右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从事编辑工作。他在此处的工作时间较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1929年，朱右白和张淑宏女士结婚。张淑宏女士出身泰兴名门，系张伯鼎先生的女儿。当时的局势不算稳定，不过商务印书馆的工薪不菲，因

① 朱右白：《诸家人性论评述·后序》。

② 朱右白：《梁门哀感录·记海淀观灯》，《鲁阳集》，第31页。

③ 朱右白的第二任夫人张淑宏有兄妹十二人，张淑宏排行第七，六姊张淑文是巴怡南的继母，由此朱右白也就成了巴怡南的七姨父。姚名达的前妻黄心勉女士因病逝世，后来经朱右白介绍，姚名达和巴怡南在1937年结婚。参见张淑蕙：《回忆姚名达烈士创办女子书店》，收入《浩气壮山河——原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纪实》（下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0年，第168-169页。

而先生婚后的家庭生活还比较充裕。先生酷爱诗文，编辑工作之余每每不忘研习创作，“每置一册案头，虽至忙之日，必择其中尤要者阅索一编，当精聚神会，百虑皆空，恍似古人之亲临，鞭策吾之左右也。已而果有所悟，下笔不感困难”。^①朱夫人也是诗文爱好者，夫妻二人常相切磋，《鲁阳集》收录有先生为夫人校改后的诗歌。^②先生也有诗歌记述了其时二人的相得之情：“况余徒有诗书好，之子尚无世俗情。门外寒霜新扑地，但能有酒愧长醒。”^③在上海工作期间，先生所交游的友朋也多是文坛中人，先生后来回忆，“僦居海上之日多，此间人士多乐好文艺”，“白亦日惟沉迷于吟哦”。^④除了国学研究院的一些同学以外，右白先生和夏承焘、李继熙等人交情较密。

1932年1月28日，日军袭击上海闸北，次日有针对性地轰炸商务印书馆，随后在东方图书馆纵火，馆内全部藏书一时间化为灰烬。东方图书馆在当时号称东亚第一图书馆，一夜之间被烧毁，诸多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朱先生对此极为激愤，从《鲁阳集》收录的多首诗歌里可体会到他对文化资源丧失的惨痛心情。1932年8月，商务印书馆复业，朱先生回东方图书馆工作。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商务印书馆总部迁往长沙（后于1941年迁往重庆），朱先生作为留沪人员在原处继续工作。

40年代，朱先生先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图书馆工作，历任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组长。其间，曾在金陵女子大学兼职，讲授历史、地理等课程。这一时期他对古代哲学、诗文理论仍有研治，出版专著多部，并发表了大量论文。后来他的学术兴趣渐转向水史领域，开始留意《尚书》《水经注》等典籍中的水史资料，着手水文地理方面的研究。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的丰富馆藏资源为右白先生从事水史研究提供了便利，这段时间里他有多篇水史论文相继发表。新中国成立前

① 朱右白：《现代诗坛·作者自述》，《右白丛书》，第112页。

② 朱右白：《鲁阳集》，第48页。

③ 朱右白：《赠淑宏》，《鲁阳集》，第57页。

④ 朱右白：《诸家人性论评述·后序》。



夕，中央图书馆逐渐往台湾运送馆藏珍籍，朱右白等人从中抵制，功不可没，对此当年的《新华日报》曾有专门报道，对先生的工作予以嘉奖。

时局动荡，人生起伏多变，但一直不变的是朱先生对学术事业的坚持。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朱先生曾与他人合著《孟子话解》一书^①，以白话文译解《孟子》，简明流畅，可读性较强。^②先生自幼喜读《孟子》，当初在国学院的论文选题便与此有关。这一次译解《孟子》，虽是承担部分工作，但也是其“孟子情结”的一种展放。在此期间，朱先生还撰写了《道统篇》《一经》《一义考索》《从“一”底哲学说到全体主义》等诸多论文，这是继《诸家人性论评述》之后他在古代哲学研究方面的新成果。

道统说自唐代韩愈明确提出以来，历宋明儒家之倡导、现代新儒家之发扬，已成为儒家学说里居于中心地位的思想传统。从韩愈到现代新儒家的道统观，一般是以心性内圣之学为圭臬，而关注外王之学的荀子和汉儒则被排除在外。^③虽然唐宋以降陆续有人提出不同看法^④，但终究不

① 右白先生撰写《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尽心上》《尽心下》四篇的注释和白话译文。

② 《孟子话解》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在1938年初版，而后台湾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73年、1977年再版。近年来此书为多种书目所收录，如郭齐勇、吴根友编著：《中华文化通志·诸子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编：《齐鲁文化研究论著目录1901—2000》（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70页；林庆彰主编：《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二辑），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曾军编著：《经学档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0页等。另外，此书还被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编的《高级中学语文》（1987年）列为教学参考书。

③ 如韩愈所言：“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原道》，《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页。）韩愈这种说法得到了大多数宋明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的承认，不过韩愈自认为接续了在孟子处已中断的“道统”，而后来的宋明儒家则一般是主张周敦颐、二程承接孟子。

④ 如唐代杨惊、宋代孙复和石介等人，都认为荀子是儒家道统的一个重要环节。晚近以来，钱穆先生、李泽厚先生等人曾对现代新儒家的道统观提出异议。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梁涛：《儒家道统说新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8-91页。